

媒介的直观

——论麦克卢汉传播学研究的现象学方法

范 龙 著

Intuition on Medium

Phenomenological Method
of McLuhan'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作为一位在**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的学者，**麦克卢汉**的声名曾经大起大落，几度沉浮。有关他的评论无论是褒是贬，大都局限为一种随意性的言说，少有学理层面的探讨，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价值；而对于其思维方法的认识则尤为肤浅混乱，长期充斥着各种不合事实、不负责任的狭隘偏颇的观点，严重阻碍了“**麦克卢汉研究**”的发展和深入……

媒介的直观

——论麦克卢汉传播学研究的现象学方法

范 龙 著

Intuition on Medium

Phenomenological Method

of McLuhan'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媒介的直观——论麦克卢汉传播学研究的现象学方法 /
范龙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 - 7 - 81135 - 212 - 2

I. 媒… II. 范… III. 传播学—研究 IV. 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3320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0693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暨南大学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1
字 数: 150 千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

定 价: 25.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范龙，男，1976年生，湖北武汉人。1999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2002年和2007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分获新闻学硕士、博士学位。2007年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在站博士后、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播理论和教育传播。曾获2008年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已在《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新闻前哨》、《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中国大学教学》、《现代教育科学》、《浙江大学学报》、《华中科技大学学报》、《重庆大学学报》、《湖北大学学报》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外国哲学》、《文化研究》全文转载或收入索引。现主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青年研究项目、华中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研究项目和华中科技大学人才引进基金项目各一项，并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项目一项。

摘 要

作为一位在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的学者，麦克卢汉的声名曾经大起大落，几度沉浮。有关他的评论无论是褒是贬，大都局限为一种随意性的言说，少有学理层面的探讨，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价值；而对于其思维方法的认识则尤为肤浅混乱，长期充斥着各种不合事实、不负责任的狭隘偏颇的观点，严重阻碍了“麦克卢汉研究”的发展和深入。

针对上述状况，本书提出可以通过将麦克卢汉的思维方法纳入现象学的视野加以考察而对之作出某种相对确切和深刻的理解与判断。本书认为，现象学作为现代西方最主要的哲学思潮之一，具有极其重大的方法论意义，从根本上标志着一种以本质直观为核心的哲学方法。通过对麦克卢汉著作的文本学解读，本书发现，麦克卢汉的传播学研究明显体现出“面向事情本身”的现象学精神，其最具代表性的“媒介即讯息”的论点宣示了可被直观把握到的媒介本质，它作为对关于媒介效应的自我意识体验加以现象学的描述和反思的必然结果，实际上正表现了麦克卢汉在有关媒介的认识领域中对于本质直观的成功运用。基于上述认识，本书指出，麦克卢汉可被视为一位主观上虽未参加现象学运动，而客观上却在其学术实践中遵循和运用了现象学的基本原则与方法的“广义现象学家”，其传播学研究与现象学方法之间存在着显著联系。

在将麦克卢汉传播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解释为现象学方法的基础上，本书进一步指出，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两大传统方法的实证方法和批判方法，本质上分别是进行事实归纳的经验方法和进行理论演绎的思辨方法。通过比较，本书认为，现象学由于从哲学方法论上解决了传统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所无法解

决的“个别”与“一般”的关系问题，用强调“现象即本质”的本质直观弥合了“现象界”与“本体界”之间的鸿沟，因此有助于消除实证方法的“经验一般化”困境并补足批判方法的“总体性”缺陷，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对这两种传统的传播学研究方法的超越。

鉴于现象学方法相对于传统方法所具有的上述优越性，本书提出有必要将现象学方法引入传播学研究，其意义在于现象学方法可以丰富传播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凸现传播学研究的时代特征并敞开传播学研究的思维视域。本书指出，在研究方法的薄弱业已成为阻碍我国传播学发展的巨大路障的情形下，必须兼容并包地借鉴包括现象学在内的西方传播学的方法论思想，以扎实的方法论研究来推进我国传播学的理论建设。

关键词：传播学 麦克卢汉 “媒介即讯息” 现象学
胡塞尔 本质直观

Abstract

As a scholar who has an important status and profound influence in the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cLuhan has a reputation which once went through repeated rises and falls. The reviews about him are mostly confined to one kind of speech at will, short of discussions on the level of scientific principle and academic values in the strict sense, no matter they are praises or censures. In these reviews, the knowledge of McLuhan's method of thinking is particularly superficial and confused, flooded with kinds of unrealistic and irresponsible viewpoints based on a narrow field of vision all along. These prejudices seriously hinder the development in the depth of McLuhan studies.

In view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the dissertation proposes that McLuhan's method of thinking may be accurately judged and deeply understood in the phenomenological horizon. The dissertation considers that phenomenology,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hilosophic thoughts in the modern west, is of extremely great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and can be radically regarded as one kind of philosophic method which takes universal intuition as its core. Through the explanation of McLuhan's texts, the dissertation discovers that McLuhan'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obviously embodies the phenomenological spirit of facing matter itself, and a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phenomenological descripti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self-consciousness about the effects of medium, his most representative argument that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declares the essence of medium which can be grasped directly and in fact displays the success-

ful application of universal intuition in medium understanding. For the above reasons, the dissertation points out that in a broad sense, McLuhan can be regarded as a phenomenologist who did not participate in the movement of phenomenology subjectively but really follows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phenomenology and utilizes the basic methods of phenomenology objectively in his academic practice, and there is a remark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McLuhan'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henomenological method.

On the basis of expounding the chief method of McLuhan'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s phenomenological method, the dissertation further points out that positive method and critical method, as the two basic traditional methods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radically are empirical method based on induction and speculative method based on deduction respectively. By comparison, the dissertation considers that on the level of philosophic methodology, phenomenology solves the proble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ity and generality, phenomenon and essence which can not be solved by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of empiricism and rationalism, so in a sense, its universal intuition which regards phenomenon as essence bridges the gap between phenomenon and body, thus contributes to counteract the weaknesses of positive method and critical method, and realizes the transcendence over these two traditional methods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view of the above-mentioned superiority of phenomenological method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methods, the dissertation propos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introduce phenomenological method into communication research, because phenomenological method can enrich the methodological system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highligh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widen open the vision of thought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e dissertation points out that in the situation that the lack of research method's having been a huge roadblock which hinder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full use of all kinds of the methodological thought of wester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cluding phenomenology, and advance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solid methodology research.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McLuhan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phenomenology Husserl universal intuition

序言一

吴廷俊

范龙的《媒介的直观——论麦克卢汉传播学研究的现象学方法》一书是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增补、修订形成的。身为他的导师，我为范龙的这一研究成果的取得感到由衷的高兴，更要对这一研究成果的出版表示热烈的祝贺！

严格说来，范龙是我招收的第一个非定向全日制的博士研究生，也是我连续指导时间最长的学生。他自1999年起便跟随我攻读新闻学硕士学位，三年后又接着攻读该专业的博士学位。屈指算来，到去年他博士研究生毕业为止，我作为他的导师已与他共同走过了八年的光阴。八年弹指一挥间，但很多往事却仍历历在目。记得他刚来华中科技大学（其时校名尚为“华中理工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报到时，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个谦逊有礼、言语不多而略显内向的青年。与他接触了一段时间后，特别是在和他共同完成了一项关于网络文化的课题后，我发现，这个性格内敛、不事张扬的学生具有两个突出的优点：一是认真，二是敢闯。所谓“认真”，是指他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办事，都兢兢业业、踏实不苟，交给他的各种任务，总能按时保质地完成，从不拖沓，也少有疏漏。所谓“敢闯”，是指他眼光独到、思维敏捷，对于很多问题都有自己个人的理解和看法，做学问的独立性和探索意识很强，看似“老实”，其实绝不满足于墨守成规。对于范龙的这两个特点，当时在我院任教的杨伯淑教授曾通过与他合作撰写《因特网与社会——论网络对当代西方社会及国际传播的影响》一书而有深切感受，并大加赞赏。而我个人认为，这两个特点的第

一次集中展示，是在范龙构思和撰写其硕士学位论文的过程中。

我指导研究生，无论硕士还是博士，一般都提倡学生本人根据自己的学术积累和研究兴趣，先行拿出关于论文选题的初步设想，然后再与老师商定。范龙很适应我的这种做法。记得当时他设计的是一个有关传播学批判学派的选题。我劝他斟酌，因为做这种纯理论研究，对一个硕士研究生来说，似乎偏难。但他坚持要做，并很快提交了开题报告，对选题的价值和可操作性作出了详细的论证，视角很独特，观点也很鲜明。我知道，如果不是平时就注重知识的积累，勤于钻研、深于思考，他是很难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形成这样一个颇有见地而又相当成熟的选题思路的。开题之后，范龙便在资料收集和文献整理上苦下工夫，几乎通读了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等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关媒介与文化问题的重要著述，最终撰写出《媒介演变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强迫性理论的再思考》一文。这篇文章由于富有创见地提出了法兰克福学派著名的“文化工业”理论或被改写于网络时代的可能性，因此在通信评审和答辩会中受到校内外多位专家的一致好评，其主体部分后被发表于《湖北大学学报》的哲学社会科学版。

如果说范龙在硕士研究生阶段的优异表现已令我对他刮目相看，那么他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于学术上所展现出的认真而敢闯的作风，则更让我感触良多。范龙在2002年博士研究生入学时，我院尚无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权，他只得随我进入我校的教育科学研究院做有关“教育传播”的研究。面对这个传播学研究中的“冷门”，想必有人会提不起精神。我起初也担心这个与其过去所关注的问题相去甚远的研究方向会削弱范龙的学术兴趣。但后来事实证明，我的疑虑是多余的——范龙不仅没有对教育传播表示排斥，反而怀着一种极大的热情投身到这一陌生的研究领域中。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通过

“恶补”教育学的相关知识，努力寻找教育问题与传播理论的结合点，相继在《高等工程教育研究》、《现代教育科学》、《中国大学教学》等刊物上发表了《论网络教学中的非实时交互》、《论中国古代书院的三种功能》、《试论课堂中“信息沟”的形成与消减——以传播和舆论的视角》、《大学学科综合化过程中应正确处理的三个关系》等一系列论文，运用传播学的基本原理解释教育现象，由此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证明了“教育”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而重要的传播活动，应该也能够被我们从传播学的层面上加以观照和研究。我以为，对于“教育传播学”这个目前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分支学科的理论建构来说，范龙的这几篇文章是具有参考价值的。

我校新闻学专业的博士点获批后，范龙转回了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此时他已进入博二，博士学位论文的开题事宜迫在眉睫。但鉴于他一贯的治学独立性，我并未急于找他商谈选题，而是等着他自己送上门来。果然，范龙来了，但所带来的选题却让我有点手足无措——什么是“现象学”？它与麦克卢汉有什么联系？这两者的联系能够成立吗？即便能够成立，我们又该作怎样的论证？尽管一系列问题涌上心头，但我没有轻易否定这一选题，而是同他反复讨论其可行性。为慎重起见，我还特别邀请我校哲学系专攻现象学的张廷国教授加入范龙的导师组，参与咨询把关。经过多次研究，三人最终达成共识：选题可行，且大有新意，如能做成，不仅将从一个崭新的角度为我们理解麦克卢汉及其思想提供途径，并还有望把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引入传播学研究。面对“诱人”的前景，我和廷国决定迎难而上，陪范龙一道去闯一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一切又是从读书开始。由于范龙未曾接受过西方哲学的专业教育，尽管平时涉猎广博，但所掌握的知识终究不够精深，故在廷国的指导下系统阅读现象学文献便成为他首先要做的功课。令人感佩的是，他不惜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不但研读了胡塞尔的《逻辑研究》、《笛卡尔式的沉思》、

《现象学的观念》、《纯粹现象学通论》、《内在时间意识现象学》、《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导论》、《存在与时间》、《面向思的事情》、《林中路》以及梅洛-庞蒂、伽达默尔、萨特、雅斯贝尔斯、施密茨、德里达等人的重要原著，还广泛浏览了国内外学者介绍和研究现象学的各种著作。在研究生普遍为缩短学制欢呼，急欲了结学业以尽快谋职赚钱的今天，范龙却为了把学问做扎实，甘愿久坐书斋而推迟毕业。事实上，正是这一年的埋头苦读，使他不仅基本掌握了现象学的原理和方法，更成功习得了一套较为地道的哲学语言。虽然不是搞纯粹的哲学研究，但在涉及哲学的地方也不能尽说“外行话”——这是我对范龙的一个要求。从他后来拿出的论文文本看，他是很圆满地实现了这一目标的，以致廷国阅后，都为他这个非哲学专业的“私淑弟子”能够写出如此味道纯正的哲学文章而惊叹。

在学习现象学的同时，范龙也没有放松对麦克卢汉的关注。为了尽可能忠实地还原麦克卢汉的思想本义并充分了解国外“麦克卢汉研究”的最新进展，我于2004年底打发他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播与信息学院作短期访问。留学狮城的四个月里，他日复一日地在图书馆中搜寻，最终携带麦克卢汉主要著作的英文原版和各种相关的研究资料满载而归。在此基础上，范龙开始撰写系列论文。先后发表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重庆大学学报》和《浙江大学学报》上的《媒介的直观——论麦克卢汉传播学研究的现象学方法》、《现象学：一种可资传播学借鉴的哲学方法》、《“媒介即讯息”：麦克卢汉对媒介本质的现象学直观》等多篇颇有分量的文章，接连被《新华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文化研究》、《外国哲学》全文转载或收入索引。这说明文中所谈的这个新鲜话题，已然引起了国内传播学界的注意。

尽管如此，范龙的这项研究由于独辟蹊径地进入“现象传播学”领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播学的传统理论框架

和研究路数，因此引起争议乃是无可避免的。事实上，自开题之日起，来自各方的质疑甚至反对之声就不绝于耳，范龙由此所背负的压力可想而知。在我看来，这项研究的确对国内传播学界产生了冲击，但它的初衷并不是要颠覆传播学的传统，而只是要反思和拷问这种传统的垄断地位而已。众所周知，在自然科学都在设法破除“独断论”的今天，人文社会科学更不可能去寻求关于人类自身及其社会的终极解释和唯一真理。面对无限丰富的世界，我们可以从多种多样的角度和层面对之加以剖析和阐释，这里没有对错正误之分，只有深浅难易之别，不过体现了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不同理解罢了——这就是科学认识的“相对性”，也是我们倡导平等自由的多元化学术风尚的原因所在。应该说，正是凭着这样一种“争鸣无罪”的信念，范龙一方面虚心听取了大量不同的意见，并诚恳地接受了其中可资采纳的部分，另一方面则始终坚守既定的研究立场和思路，持之以恒地不懈钻研，丝毫不因外界的阻力和干扰而动摇自己的决心。几经波折之后，他终于在2007年初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全文的写作，并于当年5月以90.3分的成绩顺利通过论文答辩。四个月和一年半后，这篇题为《媒介的直观——论麦克卢汉传播学研究的现象学方法》的论文先后被评为华中科技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和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在传播学研究中，麦克卢汉一直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尽管谈论传播学的人都爱把他挂在嘴边，但真正能够说清楚的人却少之又少——这不仅因为麦克卢汉学说的内涵令人费解，更因为深藏于这些学说背后的运思过程晦涩幽隐、扑朔迷离。鉴于这一现状，范龙的博士学位论文通过细致梳理和分析麦克卢汉著作中所体现出的方法论特点，发现麦克卢汉的传播学研究与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之间多有契合，尤其在对媒介的存在论意蕴加以“本质直观”而得出著名论断“媒介即讯息”这一点上，更是显著地体现出坚持直接直观的基本原则和寻求直

观基础上的本质洞察的现象学精神。在将麦克卢汉的传播学研究方法解释为现象学方法的基础上，该论文还进一步探讨了传播学研究中引入现象学方法的途径和意义，指出由于现象学方法可在克服实证方法的“经验一般化”困境和弥补批判方法的“总体性”缺陷方面，实现对传播学的传统研究方法的超越，故它的“加盟”不仅将“丰富传播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还能“凸现传播学研究的时代特征”，更能“敞开传播学研究的思维视域”。总之，该论文针对“麦克卢汉研究”中的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关键问题，在传播学与哲学的学科交叉点上求得理论突破，从选题到结论都是原创性的。而这项“前无古人”的工作，不但为我们理解麦克卢汉独特的思维方法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思路，同时还有望引发传播学界对于现象学这一重要哲学方法的关注，从而打破传统的实证方法和批判方法的二元垄断，为传播学研究开辟出可能的第三条路径。此外，对于新闻传播学这样一门重“术”而轻“学”、“实务”有余而“理论”不足的学科来说，该论文作为一项从哲学层面上探讨方法论问题的基础研究，有助于提高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学术含量，在本学科的理论建设上亦有其重要价值。

太过“认真”的人，有时容易呆板；太过“敢闯”的人，有时容易冒进。范龙的可贵之处，即在于他将这两点恰到好处地结合起来，刻苦而不失灵活，机敏而不失稳健，故庶能做到胡适先生所谓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便是其博士学位论文获得成功的关键。当然，从根本上讲，范龙的这本书并无作出某种“定论”的意图，而不过旨在提供一种“思的可能性”，使我们自问传播学能否不再只是“实证”和“批判”的传播学。因此书中所论，尽管皆可“自圆其说”，但也仅供读者参考——在这里，作者不愿将任何观点强加给任何人，正如他本人也不愿接受别人所强加的观点一样。此外，从具体写作层面上看，该书也非十全十美、无可挑剔，在某些理论的细致阐发、某些论述的浅易表达等问题上都仍有进一步完

善的必要。但我相信，凭着执着的学术追求、勤勉的学术态度、扎实的学术功底、充足的学术勇气、宽广的学术视野和敏锐的学术头脑，他一定能够把这项研究全面深入地推进下去。前不久，听说他将“现象学方法在传播学研究中的应用前景探析”成功申报为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青年研究项目，并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进站期间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对其博士后研究项目“现象学视野中的麦克卢汉媒介思想研究”的全额资助。我在这里预祝他顺利完成这些工作，以使自己沿着由博士学位论文所开辟的研究道路继续前进，取得更大的成果。

这是一个普遍浮躁的年代，急功近利已成为一种社会心态。范龙最为我所看重的品质，正是他安贫乐道、甘耐寂寞，做学问不为稻粱谋。值此他的第一部专著付梓之际，我衷心希望我的这位弟子心静气定、不淫不屈，在扑面而来的滚滚俗尘中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也守住为人为学的底气与尊严。

是为序。

2008年12月28日于喻园

（吴廷俊，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序言二

张廷国

在 20 世纪西方哲学思潮中，胡塞尔所创立的现象学以及后来的“现象学运动”之所以具有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其主要原因应该归功于现象学的方法。事实上，胡塞尔本人就经常使用“现象学”一词来意指一种“方法”或“态度”。胡塞尔的弟子海德格尔说得更加明确。他说：“现象学不是哲学科学中的一种，也不是其他科学的一种前科学，‘现象学’的说法就是科学的哲学方法的标题。”^①同时，由于胡塞尔现象学的任务是要对经验世界进行理性重构，从而为人们的生活世界奠定一个意义基础，所以，他真正关心的并不是世界“是什么”的问题，而是世界“如何”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恰好是使世界“如何”的问题成为可能的前提和条件。与之相比，一切其他的科学方法，如数学化的自然科学的方法，充其量只是一种“单纯的技艺”或一种“技术化”而已。

所谓现象学方法，按照现象学史家施皮格伯格的说法，它的基本特征在于：“非常执拗地努力查看现象，并且在思考现象之前始终忠实于现象。”^②具体而言，我们可以把现象学方法概括为两点：其一是现象学还原的方法——这种方法要求我

① Heidegger. *Die Grundprobleme der Phänomenologie*. Bd. 24, Frankfurt, 1975, S. 3.

② 赫伯特·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 [M]．王炳文，张金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964